

#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65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谭天度

## 广东党史资料 第一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茂名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8.375印张196,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11111·109 定价0.86元

## 发 刊 词

为适应党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需要，及时反映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的《广东党史资料》，从今天起和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六十多年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从开始时只有五十多名成员的小组织发展到今天将近有四千万党员的大党，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讲话中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六十年。”我们党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党史的编写和研究，对我们党所积累的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进一步充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用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继往开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可靠保证。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指出：“现在大家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

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而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我们党先后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纠正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期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就更加深切领会近几年来党中央领导同志所一再指出的：“编写党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是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我们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深刻意义。编写和研究党史，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用以教育子孙后代：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是千百万革命先烈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个战斗岗位上流血牺牲、艰苦战斗得来的。可以帮助后代及时识破可能再出现的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真面目，防止后患，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保证我们党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继续前进。

《广东党史资料》是具有史料价值的连续性书刊，它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着重以刊载广东地区的党史资料为主。广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方组织，广东党史是全国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是酝酿建党较早的一个省份，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广东地区从事革命活动，领导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革命，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红旗不倒，英勇卓绝，可歌可泣；解放后，广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作出很大贡献。把广东地区的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做好，对编写全国党史有一定意

义。我们党史工作者的一项重大的光荣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斗争史料征集起来，既为党中央编写全国党史提供广东地区的史料，同时也为编写地方党史积累材料。

《广东党史资料》要努力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依据革命历史档案，依靠各个革命时期的老同志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只有掌握丰富、准确的党史资料，才能把党史编写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历史事实进行调查，分析，考证，核实，鉴别，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最本质、最可靠的史料立起来，史实立不准，是非分不清，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希望广大党史工作者、革命老同志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把这一项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做好。

《广东党史资料》以刊登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点人物、重要会议和重大问题的有关材料为主，其中包括未发表过的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革命回忆录、调查访问材料、重大历史事件的考证或订谬、人物传记及专题研究等，并适当选刊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各方面史料。它是党史研究和教学的参考资料，同时也是向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文明思想教育提供生动的革命斗争史料的党史读物。

《广东党史资料》以为党史工作者、党史爱好者、干部和群众服务为宗旨，衷心希望得到同志们及时的批评指正。

# 目 录

- 发刊词..... (1)
- 聂荣臻同志对广东党史几个问题的回忆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1)
- 我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白区工作的回忆  
.....王世英 (14)
- 南粤风云三十年.....谭天度 (49)
- 在广东革命洪流中  
——回忆1922—1927年的斗争.....赖先声 (玉润) (89)
- 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建立及初期的工农运动  
.....梁复然 (152)

## 人物传记

- 陈延年.....杨绍练 林鸿暖 黎显衡 (171)
- 回忆杨匏安.....饶卫华 (181)
- 陈郁自传..... (192)
- 陈郁同志年表.....袁 文 (216)

## 史料选刊

- 纪念死难诸先烈.....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235)
- 追悼北江死难同志并告北江同志.....中共广东省委 (238)
- 广东党史人物笔名、别名、化名录  
.....广东省档案馆编研科编 (240)

# 聂荣臻同志对广东党史 几个问题的回忆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编者按：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同志两次访问聂荣臻同志，请他谈了有关广州起义和广东区党委、广东省委早期的一些情况，并参照他写的《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综合成这份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是我们加的。

## 一、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区委

大革命开始时，广东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当孙中山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创办了黄埔军校。我们党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广东，派了很多党员和干部到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工作。当时，广东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广东区委。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同志。区委成立了一个军委来专门负责军事工作，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广东区军委主要是负责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工作。黄埔军校一开始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黄埔军校的



学生有很多是各地党组织选派的，当然蒋介石等右派势力也安插了许多人，所以开始就有左右派的斗争。

大革命时期，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大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是广东党组织的问题，而且，首先还是关系到全党的问题。由于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了全党，这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这条错误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条错误路线统治之下，尽管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实行。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他根本不敢胜利，也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去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卖命，去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也不敢领导武装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出卖了革命。据我所知，在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前后，党内对许多重大问题有很大的争论。

“三·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及广东区委陈延年等大多数同志是主张反击的，陈独秀却不同意。陈独秀的问题，直到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时才解决。当时，党的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上面没有说过的事，下面不敢问。因此，党的下层组织许多党员对争论的具体情况是不清楚的。

我是一九二五年秋天第二次东征前夕到广州的，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员，是军校党组成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和我先后离开了国民党的军队系统。我就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协助周恩来同志工作。他主持的区委军委设在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军委的干部很少，只有几个人。

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是周恩来同志办公用的。左边有两张桌子是我和黄锦辉

办公用的。西边的房子是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住处，东边的房子是我和黄锦辉的住处。周恩来同志的寝室和办公室都很简朴，那时没有什么通讯员，比较高级一点的干部才到这里直接与我们联系。一般的人到文明路区委去联系工作。区委在文明路中山大学斜对面，是一幢木结构房子，党的机构在三楼，陈延年同志在那里，团的机构在二楼。其他各部是分散在外面办公。毛泽东同志也常到文明路区委去。那时，蔡畅和李富春同志是住在文德路。

周恩来是从法国直接到广州的，陈延年是后于周由莫斯科回国的。

北伐出师后，广东区委军委派我为特派员到北伐军中工作。我经上海到长沙时，叶挺部队还在那里，以后，北伐军攻克武昌，我也跟着进了武昌。

## 二、关于“八·一”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先是与贺昌、颜昌颐同志组成前敌军委，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过程中，我在马迴岭组织二十五师起义，结果拉出了两个团零一个连，八月二日到达南昌。南昌起义胜利后，组成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我任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自五日以前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沿途由于没有注意群众工作，许多群众对起义军的性质不了解，从而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虽然把许多追击的敌人打垮了，却没有注意到要把敌人消灭，而自己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加上天气炎热，给养困难，士兵害病和减员现象也相当严重。九月二十四日我军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由于部队长途行军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集结了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致使我军在揭阳、汤坑、流沙一带遭受严重挫折。失败后除董朗

带一个团转入海陆丰苏区，及留守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等同志领导下经赣南转粤北，在发动了湘南起义后转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之外，南昌起义的大部份部队被打散。我和周恩来、叶挺同志转移到了香港。杨石魂同志是负责协助我们转移的。我对杨石魂说，你不能离开我们，我们既不懂东江话，也不熟悉道路。杨石魂同志是个好同志，他设法找来一条小船，并亲自护送我们到香港。到了香港，找到了省委。周恩来同志病重住进医院，病愈后转往上海。

### 三、关于广州起义

#### (一) 广州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按照中央指示在香港酝酿广州暴动。十二月上旬我与杨剑英同志等一起到了广州，省委在广州进一步酝酿起义问题。这时第三国际也派了三个人来代表共产国际指挥筹备广州暴动。一个是德国人叫威尔曼，一个是苏联广州领事馆的郝希思（这是一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郝希思被捕后牺牲）。另外还有一个国际代表，名字记不起来了。在酝酿广州暴动的会议上，对应该如何进行暴动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和省委的同志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现在看，当时广州的形势，对发动起义是有利的，这就是：十月张发奎的部队开进广东，和李济深争夺广东这块地盘，正酝酿着粤桂战争；广州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是有基础的；我党在农村中仍然保存着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在张发奎的教导团里，我们有相当大的力量，一千三百多名下级军官中，有二百多个

党员，百分之九十的官兵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以上是有利条件。但也有不利的方面，即：在“四·一五”大屠杀以后，工人阶级中革命力量削弱了，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省港罢工工人很多已回香港，许多群众组织受到破坏，而且广东机器工会又掌握在右派手里。这个黄色工会控制了不少工人。我们直接领导的只是印刷工人、汽车工人、手车夫等行业的工人；在军队方面我们只掌握了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而警卫团刚成立不久，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从全国的总形势来看，革命是处在低潮，要在城市暴动组织苏维埃是不合适的。但当时教导团的活动已被敌人察觉，敌人正阴谋解散教导团，对广州工人阶级采取镇压，如果我们不暴动，就会束手待毙，革命力量不能保存。与其如此，不如我们先动手，搞兵变暴动，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然后迅速把队伍撤出去，转移到农村，藉以保存革命力量，根本不要在广州建立苏维埃。如果这样做，那是正确的。

但当时决定在广州搞苏维埃，国际代表并要求在暴动前举行总同盟罢工，然后利用罢工搞游行示威，发展成武装暴动。我们指出他们这一套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看不到广州的工人是分裂为两派的，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机器工人，要举行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指出，暴动最好选择在晚上，趁敌人戒备稍松懈时，突然发动，这样胜利的把握较大。他们却批评这是单纯军事观点。后来，暴动企图被敌人发现，形势紧迫，暴动还是在晚上发动。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和杨剑英同志到广州后，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一间房子住。后来房东看到报上登载我们以米店作掩护的机关被敌人破获，搜出了手榴弹的消息，而这家米店正是我们租房子的铺保。房东趁机敲竹杠，要我另找铺保，或另给押金，否则，要立即搬出。我给了他五十元港币之后，也就再没有提这件事了。

## (二) 广州起义的经过

在准备暴动的过程中，由于用米袋向城里偷送手榴弹的行动被敌人发觉，敌人已在部署镇压，于是，我们决定将起义的日期提前。

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起义前才通知叶挺同志，他是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的。

广州暴动是以教导团为主力，警卫团也有一部分参加。发动起义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去。教导团攻下伪公安局后，我便进入公安局。张瑞华同志是四军军医处的，她参加了起义，担任救护工作。暴动这几天，我都在起义指挥部内，我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之一。我们办公的地方在伪公安局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一个大厅，我就在那里工作，在这里工作的还有省委一些同志。

十一日凌晨起义后，珠江北岸除了长堤的敌四军军部、文德路的一个敌军机关和国民党检察院等少数机关没有攻下外，大部分地区已解决战斗。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第五军盘踞，隔江和我们打。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意见本来是正确的，但国际代表威尔曼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国际代表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张太雷同志也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十二日晚，我和叶挺同志到财政厅的天台观察各处战斗情况，看到敌人从观音山下来，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认为再坚持只能是作无谓的牺牲，于是下决心撤退。我回到公安局，在暴动指挥部门口，碰到恽代英、陈郁等省委同志，我告诉他们，敌人

已从观音山向城内冲进来了，你们赶快撤退。这时，正好有一股敌人冲到附近，我同一个朝鲜同志在那里和敌人打了一阵子，那个朝鲜同志是个机枪手，作战很勇敢。把这股敌人打退之后，因为张太雷同志已经牺牲，在暴动指挥部找不到负责人，形势十分紧急，而暴动的队伍又缺乏统一的指挥。于是，我和黄锦辉两人，只好自己下命令，自己当通讯员，我到教导团通知他们，向海陆丰撤退，他通知赤卫队撤退。教导团是正规部队，队伍较容易集中，一接到通知，即开始撤退。赤卫队多数分散在各区作战，较难集中，结果还有许多来不及撤出，最后在和敌人的苦战中壮烈牺牲。十二日上午，国民党军阀李福林部由河南渡江，各路反革命军队大举反扑，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

暴动失败后，敌人很嚣张，全市宣布戒严，不准群众出门，到处搜查，追捕参加过起义的工人。牺牲的人很多，外省籍的牺牲也多，敌人凡是捉到不懂广东话的人就杀。我回到住地，不敢立即进门，坐到天亮才进去。我和杨剑英同志在暴动失败后还在八旗会馆对面我暂住的那间房子里呆了三天，然后化装成商人到香港，路上敌人搜查，把我的钢笔抢去，但我藏在身上的红领带却没有被搜到，一直带到香港。

在广州暴动那几天，我没有见到叶剑英同志，到了香港才见到他，我和恽代英同志同他接上了党的关系。

我到香港后不久，省委要我去韶关一趟，任务是去通知朱德同志带领的那支队伍。广州暴动已失败，他们可向湖南一带转移。我到韶关马坝时，朱德同志已带队伍走了。黄锦辉同志则被派去追寻教导团，在花县附近被捕牺牲。

### (三)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今天来看，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说，主

要是没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太雷同志虽然是我们党内有威望的领导者，是一位好同志，但他是书生出身，缺乏军事常识，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就以他在十二日上午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严重的损失，领导失去了核心，形势急转直下，最后终于遭到失败。又如暴动取得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暴动的工人也很多，如果以这些武器把参加暴动的工人全部武装起来，可以组成一支很大的队伍，有计划地转移到农村，是坚持武装斗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这样，广州起义取得的胜利就会更大。可惜，当时没有这样做。本来，在十一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队伍撤出的，叶挺同志曾提出向海陆丰撤退，但被威尔曼批评是主张去做土匪。如果当时把部队从城市撤出，转移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在暴动时，这一点是不明确的。

广州暴动缺乏周密的计划，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广州暴动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和检讨失败的原因，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采取惩办主义，处分了很多同志，省委同志大多不同意他的做法。省委把这个决议送到中央后，中央派恩来同志来重新处理，他对大批处分同志提出了批评。以后，省委又重新作了一个决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对一些问题仍然有保留。

正因为没有从思想认识上去接受经验教训，所以在广州暴动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省委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搞城市暴动。一九二八年初，把周文雍同志派回广州，不久，就因机关被破坏，周文雍和陈铁军同志一齐被捕，壮烈牺牲。以后，还先后把

张善铭、区夏民等同志派到东江工作，他们也都先后牺牲了。这些同志在大革命时期都是出头露面的人物，把他们派回去，无异往虎口上送肉。这几个同志的组织纪律性都很强，他们明知工作上危险，却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在革命事业中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 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广东省委

广州暴动后，我记得张善铭曾代理一个短时期的省委书记。李立三同志来了之后，也代理了一段时间，在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后不久，调回了中央。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派邓中夏同志来任省委书记。不久，因机关被破坏，中夏被捕，经营救脱险后，被判驱逐出境。中夏是经厦门转回上海的。以后，李源同志曾任一个时期的省委书记，后在出发东江巡视工作时被捕牺牲。至一九二八年底，省委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六大”决议，同时，推选黄钊为书记（黄以后调厦门福建省委工作，因害怕困难，动摇消极），一九二九年夏，由卢永炽（绰号烂风炉）任省委书记，以后由贺昌同志来任省委书记，直到一九三〇年二月，我离开广东前，都是由他负责。我和贺昌同志调离广东时，正好是中央派罗登贤同志来任省委书记。我在广东工作期间，担任省委常委，主要负责省军委书记的工作。省军委的工作主要搞军运、兵运。广西的工作原属广东省委负责，左右江暴动时，省委派了张云逸、叶季壮、徐光英（后叛变）、龚楚（后叛变）、何畏（后叛变）等去，中央还派了邓小平同志去领导。

我在省委工作时，省委在关于东江地区的武装斗争问题上是有过争论的。东江的工作，尤其是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有广大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海陆丰农民先后经过三



次暴动，至第三次暴动胜利后才建立苏维埃政权。广州暴动失败后，由广州撤出的教导团等队伍转到了海陆丰，大大增强了革命的武装力量。当时的形势是很好的。由于教导团是一支军事干部组成的队伍，我和叶剑英同志主张以这支队伍作为骨干，去发动和组织当地农民，将使武装力量大大发展。但当时省委，主要是李立三同志不赞成这个主张，提出所谓反对知识分子的军事投机，却把这支干部队伍当作一般战士来使用，打过来打过去，到处和敌人打硬仗，硬碰硬撞的结果，不但敌人没有打倒，而自己的力量反而受到很大损失，在优势敌人进攻下，不得不放弃海陆丰苏区，转移到大南山。一九二八年春夏间，彭湃同志转移到大南山，决定在那里建立苏区。大南山在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交界之处，也同样靠近海边。对这个问题，省委也是有争论的。我和叶剑英同志是主张向北边发展，以大北山作根据地，可以通过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取得联系，背靠中央苏区，可以互相策应。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彭湃到了大南山以后，仍然象以前那样攻城掠地，拼命攻打敌人力量坚强的堡垒，虽然也得到一些胜利，但自己力量却大大的损耗。到一九二八年秋，斗争实在难于再坚持下去了，只好把彭湃同志调离大南山。

在这些问题上，广东省委之所以发生争论，主要是对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斗争问题不理解，不理解必须在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同时，保存自己的力量，壮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革命的武装斗争总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要坚持武装斗争必须要有革命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斗争是流寇主义，不可能坚持长期的斗争。有了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才有所依靠，才能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而且，也只有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巩固。有了根据地就必须巩固，而要